

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 : September 29 , 2008

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 : November 03 , 2008

從人文角度論通識教育的意義與任務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General Education :  
A Viewpoint from Humanities

黃秋韻

Chiu-Yun Huang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黃秋韻 Chiu-Yun Huang

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 Yu-Da College of Business

No.168, Shuefu Rd., Chao-Chiao, Miaoli, Taiwan, R.O.C.

E-mail : lionroar@ydu.edu.tw

## 摘要

本文欲從大學起源的精神與理念反思現今大學教育的現況，說明原本作為大學教育的「七藝」事實上即是通識的人文教育，由此反觀當前台灣的大學教育，因為過分著重專業之訓練，對於「教育」之職責有所偏廢。

所謂「教育」，應是以「人性覺醒」為出發的教育，而非專事職業技能之「訓練」。所以大學應重新回歸教育的內涵，以培養「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為職責，以建構學生整全的人格為目標，在專業的知識或技能訓練之餘，重新正視「教育」之任務。通識教育作為大學之起源以及人性覺醒之教育，實是大學教育之核心，大學「教育」的內涵須由通識教育來補足。

若以大學法中明訂大學「提升文化」的目標著眼，以及對於台灣社會現象的歷史觀察與分析，現階段台灣的通識教育應以建構深度文化為目標、以人文精神為願景，除了對於教育的職責有所補足之外，亦克盡大學所應扮演的「社會燈塔」之角色。

**關鍵詞：**大學起源、通識教育、知識份子、深度文化、人文素養

## 從人文角度論通識教育的意義與任務

在大學教育從菁英走向普及教育的今日社會，雖然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已然有所改變，然而若從新省思「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起源與理念，我們會發現現今大學的教育在回應社會及時代需求之餘，對於「教育」的本質是有所缺失的。本文從人文角度的觀點出發，論述通識教育為大學教育之核心，並指出當前大學中所欠缺的「教育」任務須由通識來補足，而台灣時空背景下的通識教育，尤須重視深度文化的培養，才能肩負起通識教育的時代意義。

首先，就從大學之起源談起：

### 壹．大學之起源與通識教育

大學的起源可溯及中國的先秦<sup>1</sup>與西方的希臘羅馬<sup>2</sup>，且中國在漢朝即有所謂「太學」，其性質、制度與規模幾可與西洋中古大學相提並論，但現今的大學制度，主要還是承自西方傳統，尤以歐洲中世紀的大學為現代大學的直接源頭。

#### 一．大學之起源與理念

中世紀大學以寺院、教堂為主要型態，其起源又可追溯至希臘羅馬時代，從西元四世紀起，羅馬帝國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教會便擁有了國家的教育大權。六世紀時，波其武（Boethius，480～525）提出了「七藝」（Seven Liberal Arts Education）作為知識份子的必修科目，其後為巴黎大學首先採用，並成為所有大學入門的共同必修科目。七藝的內容包括學術形式的「三目」——文法、修辭、辯證，以及學術內容的「四科」——算術、幾何、音樂、天文。事實上，七藝的教育可遠溯自西元前六世紀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的教育思想，此種七藝教育就是現今的通識教

---

<sup>1</sup> 禮記：有虞氏養國於上庠。此即相當於今之大學。

<sup>2</sup> 西洋從查理曼大帝(即加祿大帝 Karl der Grosse, 742-814 A.D.)的「養士」之風開始，從歐洲各地召集知識分子，在其宮殿內研究學問，並在宮廷旁廣設修道院，教導收容的難民識字抄書，進而廣徵天下圖書，在各地成立圖書館，即具備了大學的雛形而為大學的前身。參閱鄔昆如，〈大學的理念與發展〉一文，收錄於《大學入門——開創成功的大學生涯》，台北：遠流，1998。

育<sup>3</sup>，「通識教育」在歐洲語系早期用法為「Liberal Arts Education」，意涵的內容便是要提供古希臘城邦自由民的教育，以哲學思辯、文藝創作、探索世界真理等方面知識能力的教養為主，提供古希臘城邦自由民專注於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培養。古希臘屬於奴隸制度，所有的生產勞動都由奴隸提供，自由民的教育便不需要技職專業的訓練，由此可見，歐洲大學教育自始便是通識教育，這也正是今日普遍認為通識教育為「非技職、非專業」教育的來源。

除了「七藝」的教學內容與通識教育直接相關外，大學的學院設計亦以「全人」為考量。最早成立的巴黎大學，以初階的「人文」以及進階的「神學」、「法律」、「醫學」統合成四大學院，其後又以《聖經·創世紀》的啓示，規定大學的三大學院為「人文」、「社會」、「自然」。十三世紀之後，各地相繼成立的大學之間皆具備相同的特色——在神學院的基礎上增設其他學院，並以人文、社會、自然三學院為大學的主體。其中人文學院所要探討的是「人與自己」的關係；社會學院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自然學院探討「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此種統合「人與自己」、「人與人」以及「人與萬物」之關係為整體的探討，實即是現代所謂「全人教育」的基本內涵之一。此外，在封建制度尚未消除之際，此三大學院基本上是為貴族所設，以培養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為目的，不同於醫學院或神學院，可供一般百姓就讀，所培養出的服務性「專業人士」並不可與「知識份子」等同而論。

對於大學之學院，另有一說認為，大學開始時除了初階的人文學院，其他學院各學系皆是依照社會各行業的人才需求而建立的，但是此種「實際性」的完成乃由高一層的「學術理論」所領導。農學院、工學院，甚至是醫學院，都需要以理學院的數、理、化學科做基礎，這種「理論」與「實踐」間的相互關係早在巴黎大學完成之初即看出端倪。其「初階」的人文與「進階」之神學、法律、醫學的劃分，亦正說明了「人文」是通識，而為低年級大學生所共同必修；進階的學門則是「專業」的部份，為高年級進入專才訓練的階段。<sup>4</sup>

綜上所述，無論是以「七藝」為內涵的人文教育，或以人文為初階的通識教育，以及以「全人」為出發的學院設計，都說明了大學教育以通識為基礎，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專業人員的培養，都必以成為「知識份子」為前提。

<sup>3</sup> 參閱林孝信，〈什麼是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目標為何？〉，《通識在線》，2006，v1,頁14-15。

<sup>4</sup> 參閱鄔昆如，〈大學的理念與發展〉一文，收錄於《大學入門——開創成功的大學生涯》，台北：遠流，1998。

## 二·知識份子

既然最初大學的設置以培養知識份子為基本要求，現今的大學亦不能例外。但該具備怎樣的條件才算是知識份子呢？

廿世紀對於知識份子論述最有名的兩大類型，可以葛蘭西與班達兩人為代表。其中葛蘭西認為「所有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份子的作用。」而班達則認為「知識份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sup>5</sup>此兩大類型分從不同的角度與功用看待「知識份子」此一角色的扮演。

葛蘭西指出，在社會中履行知識份子作用的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在社會上，階級或企業運用這類知識份子來贏得更多的權力，獲取更多的控制。此為一般對於知識份子較為共通的看法。持另一意見的班達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則是極為嚴格與理想化的，他說，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簡言之，就是樂於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

薩依德在這兩大極端的定義之間，提出了既能體現知識份子理想且又能發揮實際作用的知識份子形象：

我堅持主張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認為，對我來說中心的事實是，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sup>6</sup>

他認為專業人士不等同知識份子，因為現代的專業人士現在看重的是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像真理或自由這類的普遍價值。在他來說，專業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薩依德慨言今之所謂知識份子，已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他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換言之，知識份子的職責應該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與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

<sup>5</sup> 參見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頁 41-43。

<sup>6</sup> 參見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頁 48。

所以知識份子除了要有基本的道德要求、內在品德能做為社會之表率之外，他還必須具備人文的涵養與歷史意識，對於社會的現象能有敏銳的思考能力與洞察能力，並能提供社會大眾一個較高的理想與批判標準，以期帶領整個社會國家朝理想的目標邁進。然而，就台灣的現況而言，大學教育並未將教育的目標設定在知識份子的培養上，甚至大學中的教師們亦未曾以知識份子的使命自居，致使整個大學教育欠缺該有的理想性，此乃甚為可惜之事。誠如夏鑄九先生所指出<sup>7</sup>，台灣的知識界在學術領域裡也向市場法則看齊，要求競爭、追求量化，學術工作者根本沒有功夫來管國家社會的事。SCI（科學引文索引）、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行之過度，不但不尊重不同學術領域之間的差異，更傷害了學院本身的知識深度，讓知識份子沒有足夠的人文視野，同時，也大大削弱了學院的自主性。

所以，知識份子應該具備真正的知識能力，具備歷史縱深的視野，通過對歷史的認識去認識自己，建構主體，將自己的專業與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結合起來，才能體現對在地的關懷，並有能力迎接全球視野下的專業新定位。此亦為現代大學教育所應致力的方向。

### 三．大學教育的目的與危機

從西方設立大學以來的發展歷程中，大學設立的目標與定位經常是隨著時代而改變的，歐洲中世紀以七藝為教學內容，培養貴族階層成為知識份子，其教育是以人文為主的博雅教育。十八世紀以前，大學只供小部分人就讀，目的在於培養少數幾種專業人士、紳士、牧師或官僚。十九世紀開始，以德國為首的大學，開始重視科學和研究，大學除了傳承知識（教學）以外，還要肩負創造知識（研究）的使命。美國則在 1862 年的莫里爾法案中促成各州廣設農工大學，大學開始與國家發展的需求結合。二次大戰以後，大學教育開始由菁英階段走向大眾化階段、甚至普及階段。<sup>8</sup>社會發展的需求促成了大學的擴張，從此，大學的內涵轉而為符應社會需求，以及對職業技術人才的造就。台灣在此世界的潮流中，大學的發展亦不例外。

然而，若只著眼於培育實用性較高的人力資源，忽略大學的理想性，就容易造成大學師生視野的窄化，當實用目的與利益追求的取向高於對學生整體人格的培養

<sup>7</sup> 參見中時部落格，知識分子必須關心社會（知識分子省思與對話 17）

<http://blog.chinatimes.com/prayer/archive/2008/04/17/269936.html>

<sup>8</sup> 參閱朱建民，〈大學普及下的通識教育〉，《通識在線》，2006，v4，頁 6-7。

時，大學教育便流為職前訓練，自然無法造就出探究真理、獨立思考的大學生，亦無從發揮大學引導社會發展的功能。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 (Karl Jaspers, 1883~1969) 認為，大學不應只顧及社會的需求和實用的目的，它肩負了四項重要的任務<sup>9</sup>：1. 研究教學和專業知識的講課，2. 教育和培養，3. 溝通精神的生命，4. 學術世界。所以他說：

眾多大學存在的現象，造成了毀滅真正學術的趨勢，因為學術配合了大眾，而大眾只顧實際的目的、考試以及和這些事情有關的東西。研究工作只限於那些可以有實際用途的，於是學術工作就限制於可了解、可學習的事物上，本來應該生存在無止境的求知慾浪潮中的大學，變成了普通的學校。<sup>10</sup>

這裡指出了大學教育的實用化與一般化，對於大學的功能來說其實是一種危機。所以他又說：

大學中的培養工作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完全的。但是對於完整的人的形象來說，理智和哲思能引起人無限探究和解釋的欲望。……通常所稱的培養事業技能只是培養過程中的一部分。<sup>11</sup>

培育學生整全人格、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與求知欲，都是大學教育所必須達到的目標。

除此之外，前哈佛大學校長伯克亦曾指出，當代社會對於專業知識、科技發明和終身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提供了大學創造財富的商機，無論是體育活動、科學研究或推廣教育，都成了有價商品。學術與商業結合，固然得以學習企業界的效率和精神；但一旦追求利潤超越一切，學術價值即淪為商業化的祭品，高等教育的使命勢必崩壞。<sup>12</sup>

我們亦可以此標準來反觀台灣的現況：民國八十三年修訂之大學法中指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所謂的「培育人才」指的應是培育具有通識基礎之專業或專門人才，相較於舊大學法<sup>13</sup>中只重專業技能的「專門人才」而言，應該具備更加基礎性與完整性的意義。然而，儘管新

<sup>9</sup> 參見〈教育和大學〉，《雅斯培論教育》第十五章，台北：聯經，1984，頁 68。

<sup>10</sup> 〈教育和大學〉，《雅斯培論教育》第十五章，台北：聯經，1984，頁 64。

<sup>11</sup> 〈教育和大學〉，《雅斯培論教育》第十五章，台北：聯經，1984，頁 84。

<sup>12</sup> 參見德瑞克·柏克著，楊振富譯，《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台北：天下遠見，2004。

<sup>13</sup> 民國十八年公佈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的任務為「養成專門人才」，此後民國卅八年及六十一年之大學法修正均規定，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目的。研究學術與培養專門人才成為我國大學教育的主要方向，對通識能力的培育並未提及。參閱陳柏彰〈新世紀我國大學教育目標與課程的改革方向〉，收錄於楊國樞、瞿海源、林文瑛編，《新世紀大學教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定大學法修訂了大學教育的目標有五大主軸，但目前國內的大學教育似乎只朝著「服務社會」與「國家發展」的導向，大學成了提供就業所需人力的場所，甚至連「學術研究」都帶著高度的產業化取向，對於「人才培育」的基礎面向關注有限，在「提升文化」的用心上更是空白一片。

大學畢竟是「教育」的機構，黃俊傑先生亦認為大學責無旁貸必須參與學生生命的成長，而不是僅集中開發學生生命的某一個特定面向，以提高學生畢業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求職競爭力而已。換言之，大學不應該放棄「協助學生生命成長」與「弘揚社會正義」這樣的教育職責與社會責任。<sup>14</sup>此外，大學也是社會的良心，對於社會現象的脈動，知識份子應該要能做出適切的判斷，如果沒有辦法培育出能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精神的大學生，也就無法為社會大眾建立價值判斷的標竿。

換句話說，理想中的大學，應該同時具備三種功能：一、致力知識創新。二、協助學生生命成長。三、弘揚社會正義<sup>15</sup>。所以大學不應片面發展為僅重學術研究的「象牙塔」或專事社會服務的「服務站」，誠如金耀基<sup>16</sup>先生所說：從大學的本質與長遠的發展看，大學雖然應該以其專有的知識來服務社會，以解決或疏導當前的問題，但它不能太過重視「當前」的問題，或有急功近利的作法。它必不可在「當前」與「實際的」問題之壓力下，放棄或影響到它探求真理、造育人才的「長遠」而「根本」的使命。

## 貳・通識教育之內涵

大學教育的目標在於使人的理性與感性，知識及人格獲得平衡的成長，這些目標無疑地應亦應做為通識教育之內涵。楊國樞教授亦曾提到：「通識教育的目的，在使大學生之思想、知識及人格獲得均衡的發展。這些目標，與大學教育的目標不謀而合。」<sup>17</sup>即從大學教育的目標及通識教育的意義來看，大學教育絕不可流為「技術訓練」或窄化為「職業訓練」，而應定位在使「人」成為「人」的教育，而通識中心即是此目標之推手，「大學教育的很多目標必須通過通識教育方能達成」<sup>18</sup>。

<sup>14</sup> 參見黃俊傑，〈什麼是「一流大學」〉，《通識在線》，2006，v3，頁 22-24

<sup>15</sup> 同上。黃俊傑，〈什麼是「一流大學」〉，《通識在線》，2006，v3，頁 22-24

<sup>16</sup> 參見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2003，頁 140-141。

<sup>17</sup> 楊國樞，〈大學之理念及其實踐〉，收錄於《大學理念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逢甲大學，2000，頁 1。

<sup>18</sup> 通識教育是正常大學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為大學教育的很多目標必須通過通識教育方能達成。參見楊國樞，〈大學之理念及其實踐〉，收錄於《大學理念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逢甲大學，2000，頁 10。



## 一·教育之目的：使「人」成為「人」

人的問題基本上是文化問題，文化的內容涵蓋了思想與審美、理性與感性，以及人類面對可知與不可知的方式等等廣闊範疇，例如懷德海（A. N. Whitehead, 1861~1949）在其《教育的目的》一書中，開宗明義便說：「文化是思想的活動，是對美和人類情感的感受。零碎的知識和文化無關。一個僅僅見識廣博的人是上帝的世界裡最無用和令人生厭的人。我們的目標應當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有某個特殊方面專門知識的人。他們的專門知識，將給他們以起步的基礎；他們的文化，將引導他們如哲學般地深邃、藝術般地高雅。」<sup>19</sup>換言之，對於通識教育，懷德海認為它本質上是一種思想和審美教育，它是通過傳授思想深刻的哲學名著、富於想像的文學，以及藝術的知識來進行的。

懷德海這種論點並不與專業訓練衝突，他認為「技術教育和通識教育(自由教育)之間的對立是錯的，教育應該培養學生充分瞭解，同時又能善於行動，這種實際與理論的密切配合，對雙方都有益。」<sup>20</sup>會有通識與專業訓練衝突的想法主要是由於對「教育」的內涵之誤解，混淆了「教育」和「訓練」兩者的意義，如果教育只是訓練，那麼衝突確實存在，但如果教育不只是訓練，那麼兩者間應是相輔相成的。

例如兼具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的學者張一蕃即認為：「訓練是透過教導和演練，使受訓者熟練某種技能（如駕駛訓練）或具備某項條件（如體能訓練）。無論技能或條件都有具體明確的內容和可評量的指標」，而「教育是經由教導而育成。相對於訓練強調由外向內的注入和塑造，教育著重的是由內而外的發展和成長。英文 Educate 一辭，源於拉丁文的 E-ducere，E- 是意義為「出」的字根 ducere 為動詞，意為「引」；換言之「教育」原有將人的內在引發出來之意涵。廣義的教育目標，是受教者素質和能力的全面極致發展；它是個性化的，沒有一致的標準。」<sup>21</sup>張一蕃強調的「教育是個性化的」，是「將人的內在引發出來」等意義具體來說，即是一種使「人」成為「人」，或者說是使已受到哲學上所謂「異化」(alienation)的人，還原為原來「完整之人」或「全人」的歷程。

<sup>19</sup> 懷德海著，吳志宏譯，《教育的目的》，台北：桂冠，1994，頁 1。

<sup>20</sup> 懷德海著，吳志宏譯，《教育的目的》，台北：桂冠，1994，頁 58-59。

<sup>21</sup> 以上兩段引文參照張一蕃，〈教育不是訓練—通識是專業的先決條件〉，《通識在線》，2006，v3，頁 5-6。

## 二·通識教育作為「人」之教育

法國哲學家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 1882-1964 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塑造人(to shape man)，或者是去指導使人成為人的那種活生生的動力。...教育並不是動物訓練，人的教育是一種人性的覺醒。<sup>22</sup>他在分析當代教育現象時指出「當代教育手段對於教育目的之超越」等特徵，即具體指出今日的教育手段太好了，以至於使我們看不到目的。」他又說：「如果教育目的是幫助和引導人們自我完善，那麼，教育就不能迴避哲學上一些難題和糾紛。例如，從一開始教育就不得不回答：人是什麼，此一問題。」<sup>23</sup>這種理想的教育目標在實際運作時，卻往往因為社會的價值觀而被狹隘化，刻意的偏重某些技術知能的發展，進而「常常使年輕人成為令人麻木不覺，成為過量作業或雜亂無序的專門化之下的犧牲品」<sup>24</sup>。一旦年輕人麻木不覺了，即使再優秀，也只不過是愛因斯坦口中所說「訓練有素的狗」，或如 Harry R.Lewis 所言「失去靈魂的優秀」<sup>25</sup>。

相近似的反省觀點在台灣亦有許多學者提出，張一蕃先生即針對「教育的目的」指出：

教育的目的在優化和提升受教者的品格、素養與能力。大學的理念與功能，已因高等教育的普及而趨於多元；然而既然它們歸屬於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類群，仍然有共同的特質。哈佛大學前校長 Derek Bok 主張「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表達溝通的能力、批判思考的能力、道德思維的能力，以期成為優秀公民，適應多元的社會並迎接全球化的世界，也要讓學生養成廣泛的興趣，並為投入職業生涯做好準備。他並沒有忽略職場所需專業能力的培養，但這畢竟不是大學教育的唯一或最重要目的。即使是以技術專業取向的學校，仍應重視就業專業技能之外一般素養，否則就只是一個職業訓練所而非高等教育機構了。.....哈佛大學從來沒有強調為就業而教育，然而也從來沒有人懷疑哈佛畢業生的職場競爭力。<sup>26</sup>

<sup>22</sup> 馬里旦：〈教育的目的〉《面臨抉擇的教育》，桂冠圖書公司，頁 2。

<sup>23</sup> 馬里旦：〈教育的目的〉《面臨抉擇的教育》，桂冠圖書公司，頁 3-4。

<sup>24</sup> 同上，頁 24。

<sup>25</sup> Harry R.Lewis（前哈佛大學哈佛學院院長）所言「失去靈魂的優秀」，專長：計算機科學專家）寫了一本書：《Excellence Without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失去靈魂的優秀—哈佛如何忘卻其教育宗旨？》

<sup>26</sup> 張一蕃，〈職場競爭力必須建立在通識教育基礎上〉，《通識在線》。（張一蕃，輔英科技大學校長）

這種有關教育目標的反省在台灣已日漸普遍，例如黃俊傑先生亦曾對教育部「五年五百億」<sup>27</sup>的獎勵指標提出批評，他說：

教育部訂五項評判「頂尖大學」(5 年 500 億預算)標準，所強調的只是大學在實用方面的貢獻。其缺點是只重視大學的工具性角色，而犧牲了大學的本質性功能.....教育部所訂五項評判所謂「頂尖大學」的標準完全犧牲大學延續本國文化傳承之功能，屈從於國際學術霸權，也使大學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發工廠，為政經結構中的既得利益階級而服務。<sup>28</sup>

根據黃俊傑的研究，很明顯的教育部在全國最大的教育資源的分配案上，違背了大學首要任務就是塑造「人」的任務，而只重視大學的工具功能，犧牲了大學的本質性功能，同時，亦忽略了參與學生生命的成長，培育學生整全的人格的目標。在改善的方向上，如欲參與學生生命的成長，具體而言即必須重視通識教育，培育優質的師資，進而規劃優質的課程品質與教學方法，使其真正發揮生命教育的功能。

換句話說，通識教育基本上即是作為「人」之教育，負有使學生成為以良好的「倫理素養」、「溝通能力」、「創意」、「應變」等能力「保障」專業能力之「執行效果」的責任。而台灣長期欠缺優質通識教育的理由除了上述政策面的缺失外，另一主要的原因即是長期欠缺深度文化的發展。

## 參·台灣之通識教育應以建構深度文化為目標

台灣長期欠缺深度文化發展的原因，和前文所指出，當前大學教育在急欲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之餘，全然忽略大學法中所明定之「提升文化」的目標有關。以下本文試圖從「斷層文化」的觀念進行台灣現象之觀察與分析，並從人文素養的角度析論此一狀況下，未來通識教育發展需要著重的方向。

<sup>27</sup> 教育部在民國 94 年公佈〈《邁向頂尖大學計劃》標準有五項：(1)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及培育相關產業實用人才培育質與數量增加。(2)國際論文總數及影響指數排名之提昇。(3)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 增加。(4)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數增加。(5)平均每年輔導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成長。

<sup>28</sup> 黃俊傑：〈什麼是「一流大學」？〉《通識在線》，2006，v3，頁 22-24。

## 一．從斷層文化說起

台灣文化並非原生型文化，它具有一種斷層式的文化特徵，此一特徵即影響了人的特性故而需要符合其特性的通識教育之規劃。所謂的原生型文化一如希臘、印度與中原等古原生性文明，長期影響周邊文化發展，是為區域文明之文化母體。相對原生文化言即是斷層文化，即其文化非屬原創，多為移植進入，數十年或數年一變，追隨潮流而無主體性。台灣從十七世紀以來經歷了五個政權的統治，經過了「荷、西殖民時期(1624~1662)」、「鄭氏王朝(1662~1683)」、「清治時期(1684~1895)」與「國民政府(1911)」統治迄今，每一階段的統治必定留下其文化足跡與影響力，並且，由於其來台多半以軍事目標與經商的目的為第一要求，故對文化的耕耘實少有著墨。

此一事實加上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民等多樣族群，即形成下列兩項結果，第一是台灣文化的多元性，例如台灣的語言、飲食習慣與民情風俗的複雜與多樣化。第二，台灣易於接受外來文化，文化具有淺根性與易遭取代性，例如早期的崇尚歐美潮流，以及近年的哈日與哈韓風潮；無疑的以第二項喪失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較為嚴重，若根據本文第一單元的分析，大學應以培養知識份子為己任，而知識份子又兼負「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任務來說，如何將台灣多元性的文化融鑄成自身的深度文化，以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避免作為全球化浪潮下各國流行文化與消費文化殖民地之問題，應是大學教育必須深切關注的方向，也是長遠的耕耘台灣人文素養時所必須著重的，而此大學教育的關注點則須從通識教育來著手。

## 二．從教育與社會現象觀察

再從教育與台灣社會現象觀察，台灣由於四面環海，自古以來重視海外市場，商人走遍兩岸求生存成為生活常態。這種求生存的目標一方面形成堅毅不拔的民風，使百姓能吃苦耐勞，堅苦卓絕，但，另一方面卻亦形成重視實用性，以「功能論」為唯一價值的社會目標與教學制度。例如大學的分科、分系即是「實用性」的「職業訓練所」之設計；事實上，由於大一新生對自我的認識相當有限，學生常有選錯系所與對課程不感興趣的情況出現。大二或大三再分系或許能解決部分問題，然而，最終的反省卻是我們今日的教育所訓練出來的公民，多半是精於就業，疏於生命，或是只會就業，不知道如何經營多彩多姿人生者。

由於這種「功能論」下產生的人生觀所接觸者多半只有就業目標，故而生命的寬廣度即略顯狹隘，一旦遭遇困厄即極易落入沮喪與憂鬱，台灣學生近年憂鬱症明顯提升即為例證<sup>29</sup>。此種「功能論」類型的社會現象不只出現在學生，亦成為台灣普遍的社會現象，許多青壯族一旦遭遇挫折也是陷入沮喪與自裁的企圖中，<sup>30</sup>此種社會現象不得不令人憂心忡忡。

由於台灣經濟衰退的重大意義並不在其危及生存，而在於由於政治亂相、媒體助虐與人文素養低落的情況下，導致百姓的生活心情低落，人民全無生活心情可言才是值得關注者。台灣人民早已擁有起碼的政治自由，經濟也已達到相當程度的開發，所缺者只在於「生活」的權利，具體來說即是生活心情，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台灣社會卻缺乏柔性的文化氣息，高教育而低人文素養的問題有待解決。

### 三．從人文素養角度著眼通識教育的重要方向

人文素養低落使台灣民眾普遍欠缺對政治操作與媒體亂相的免疫能力，判斷力與批判能力之不足，極易使民意代表與記者言論成為民眾的教育者；加上對立的雙方各執一詞，極易使百姓在觀念上產生混淆。在欠缺真實背景的狀況下，公眾人物雖言之鑿鑿但卻皆言過其實，發言者多半欠缺純樸的表達動機。此一現象在台灣可以被長期發生與發展，即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觀眾與選民是默許的，或者說是無力反抗的；若說是無力反抗原因無它，即我們的百姓在煩悶之際找不到病因，故而無法對治。再深究這批成人進入社會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即可更具體的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一種科系對應一種或數種行業的需求是其成立系所之動機。學生大學四年的主要任務，只在於以專門知識的學習，以獲得一技之長與考取證照為目標，故而相當欠缺與生活相關的「背景性能力」的學習與薰陶。台灣的大學生甚少被教導如何去思考生命的問題，相較於以「何謂生命？」「人應追求什麼？」「是否所有的組織皆伴暴力？」「是否所有的交易皆必須伴隨利潤？」等問題作為高中畢業生哲學考題的法國而言，他們培養所有的學生不分理工、人文與商業，在

<sup>29</sup> 例如日前董氏基金會公佈大學生憂鬱情緒與求助行為調查，自認嚴重到需求助的憂鬱情緒比率高達二成五，以全台 132 萬大專生推估，恐有 33 萬大學生感到憂鬱。(人間福報 2007.10.05.論壇)

<sup>30</sup> 根據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國人自殺死亡人數突破 4 千人，粗死亡率達每十萬人口 18.8 人，較前一年增加幅度高達 22.9%。若從年齡分層來看，發現青壯年近來成長趨勢明顯陡升，而這些屬於國家具有競爭力的年齡族群，卻出現自殺率增加的情況，讓人相當憂心。(立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ly.gov.tw/ly/01\\_introduce/0103\\_leg/leg\\_main/leg\\_news/leg\\_news\\_02.jsp?](http://www.ly.gov.tw/ly/01_introduce/0103_leg/leg_main/leg_news/leg_news_02.jsp?))



進入大學或進入社會成為一位合格選民之前皆須能深刻的思考並回答上述問題，台灣的教育環境下，學生相對的欠缺了以成熟的視野探討上列問題的能力。

以此觀點而言，台灣的大學教育理念相對來說是停滯不前的。熟悉台灣通識教育發展的資深學者林孝信先生提到，許多大學教育往往還是政府追求富國強兵的主要工具，他說：

許多低度發展國家在歷史上都曾獲多或少地遭受帝國主義堅船利砲的侵略，因此其教育政策便以富國強兵為潛在的指導思想。教育的專精化、技職化很自然地便成為追求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教育的這種工具主義哲學，在第三世界國家十分普遍。中國從清末洋務運動，就是這種工具主義哲學的典型。工具主義誠然會有部份的效果，卻難以創造偉大燦爛的文明。歐洲近五百年文明的大放光彩，獨領世界風騷，絕非僅靠技職或專業教育的成功。牛頓科學革命固然有技術應用的工具層面，更重要是牛頓科學對人類思想的啟蒙與解放作用。事實上，沒有牛頓科學革命，就不可能有十八世紀以「科學，理性與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歐洲啟蒙運動——歐洲現代性思想的基礎。要讓中華文明在新世紀也如經濟領域一般地「和平崛起」，必須超越工具主義的教育理念。<sup>31</sup>

林孝信先生的觀點一針見的，他指出了台灣未來通識教育的重要方向在於強調「思想」的轉移與提升，必須超越工具主義。具體而言，「思想」的轉移即是「人文素養」的提升，因為，所有的制度改革有賴「人才」，特別是此一「人才」的品質與德性，例如：所有完善法律的執行有賴良好的執法動機，所有媒體記者的語言有賴純樸價值觀的導引，這些皆有賴人文素養對人品質的提升，以增進台灣社會的人心穩定，以及人民生活心情的助益；這些預期之目標亦是今日所有大學增加人文性通識課程所能帶給台灣的正面效益。

## 肆・結論——通識教育的時代意義

面對當前台灣教育的需求，我們大致可從以下兩個方向來著眼：

<sup>31</sup> 林孝信：〈什麼是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目標為何？〉，《通識在線》，2006，v1，頁 14-15。

## 一．警惕台灣現象：R.O.C.的新詮釋——Republic of Copy

學者方國權指出了「台灣奇蹟」成為過去式的原因在於學生就沒有將知識內化為個人創意的能力，他說：

R.O.C. 是 Republic of Copy，正因如此，遭逢全球經濟環境變遷之際，「台灣奇蹟」儼然成為過去式。追根究柢，即是技職教育的偏食現象，只側重「專業教育」，欠缺「通識教育」，欠缺藝術、美學、人文等素養。學校沒有提供通識博雅的訓練，學生就沒有將知識內化為個人創意的能力，產業也就沒有升級的希望。<sup>32</sup>

方先生不僅指出了台灣產業升級困難的原因，也指出了通識教育在台灣時代意義在於補強長期以來我們將教育內涵簡化為「專業教育」的偏食的價值觀，並針對台灣人才只懂模仿與複製欠缺創意與研發的能力的現象，進行改善與提升之基礎性重建工作。

## 二．培養「遠見」、「願景」(vision)與「人文精神」

根據本文以大學應有之「大學理念」出發，大學之目的在於培育知識份子，並透過知識份子反省台灣社會現象，進而從社會現象之弊端反思過去大學教育目標之危機等系列的思考脈絡分析，我們期許透過所有台灣的大學對通識教育的著重，為台灣培養出一批具有「遠見」、「願景」與「人文精神」的公民與專業人才。

所謂「遠見」即是擁有「長遠」的「見識」，所謂的「長遠」即必須在時間上涵蓋古今事變之疑，在空間上跨越東西文明之精神。而所謂的「見識」具體而言即接近劉兆玄先生指出的「五識」，包含知識、常識、見識、膽識及賞識<sup>33</sup>。這五項指標即包含知識的、生活性的、洞察性的、敢於嘗試的，以及美學性的等等人格特質，是一種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亦是一種全人理念的落實方式，同時，在文化脈絡發展上亦與儒家自古以來的聖人修養觀具有相當的一致性。<sup>34</sup>

在「願景」(vision)與「人文精神」方，「願景」代表人的理想的、信心的與有關未來的希望之展現，願景包含著主觀的建構與客觀的努力兩者統合之過程。此一

<sup>32</sup> 方國權：〈技職教育的雙璧—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通識在線》，2006，v3，頁9。

<sup>33</sup> 劉兆玄，〈何謂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的目標〉，《通識在線》，2006，v1，頁8-9。

<sup>34</sup> 黃信二，〈從儒家觀點論「全人」之哲學基礎〉，《全人教育學報》，第三期，2008。



目標在通識教育中，我們可以透過「人文精神」的創造與培養進而實現。人文精神著重者在對人的潛力的開發與培育，使大學生不但能了解自我、開發自身潛能，更融入社會，了解人生應追尋的目標與意義。

所以，人文精神或人文教育基本上應做為通識中心規劃課程的主軸，在西方的大學中，通識教育常被等同於人文教育。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系統裡，並沒有 Liberal Education 或 General Education 這一類別。通識教育的書籍都被歸類為人文教育 (Humanistic Education)。事實上，歐洲近代大學的建立始於文藝復興的前夕，當時大學教課內容所繼承古希臘的七藝教育 (Seven Liberal Education)，正是古希臘人文的精華。這些都說明通識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密切關係<sup>35</sup>，亦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目標在於人文精神之主動建構。

一般總以為「人文精神」無用，與就業準備無關，但事實上，「人文精神」除了可與學生的專業能力相輔相成之外，亦可以做為專業能力培養的基礎。黃俊傑先生對於人文精神之重要性亦曾指出：

所謂「人文精神」的培育與未來的職場競爭力，不僅並不相尅，而且相輔相成。現代大學教育均注重學生專業能力的訓練，培養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能力。在分工體系日益精密的現代工業社會中，這種教育理念有其現實的基礎，無可厚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專業能力的同時，許多大學卻相對地忽視專業能力之外的「人文精神」的創造與培養。因此，「人文精神」在專業掛帥而且學術分工日趨精細的現代大學教育中，就顯得十分重要，而與學生的專業能力相輔相成。<sup>36</sup>

按照此一觀點「人文精神」之「無用」正如莊子理論中的原則，可以說它是一種「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背景性能力的建構；即透過通識教育以協助學生生命成長，並培養一批既有專門知識，更了解專門知識應放置在生命中正確位置的學生。如此台灣的高等教育即可不至過度世俗化，而遠離了最初大學成立的理想，不但能符合社會就業的普遍目標，更能培養出社會所需、可以具備指導與監政府的能力，又有思考與具獨判斷能力的選民；如此方能使台灣的新生代確保擁有對未來的理想性，以及願意深耕人生，立足台灣與放眼全球之志向，本文即以此一觀點代總結，希望對於人文與通識教育的重視有所拋磚引玉之效。

<sup>35</sup> 參考〈通識教育與人文精神〉專題導言，《通識在線》，網址：  
(<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epaper/10/V10-1.htm>)，擷取日期：2008/6/12。

<sup>36</sup> 黃俊傑，〈以人文精神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通識在線》，網址：  
(<http://www.chinesege.org.tw/geonline/epaper/10/V10-1.htm>)，擷取日期：2008/6/12。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1. 《大學入門——開創成功的大學生涯》，台北：遠流，1998。
2. 《大學理念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0。
3. 方國權，〈技職教育的雙壁—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通識在線》，2006，v3，頁9。
4. 朱建民，〈大學普及下的通識教育〉，《通識在線》，2006，v4，頁6-7。
5. 艾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2004。
6. 林孝信，〈什麼是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目標為何？〉，《通識在線》，2006，v1，頁14-15。
7.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台北：時報，2003。
8. 張一蕃，〈教育不是訓練—通識是專業的先決條件〉，《通識在線》，2006，v3，頁5-6。
9. 雅克·馬里坦著，高旭平譯，《面臨抉擇的教育》，台北：桂冠，1994。
10. 雅斯培，《雅斯培論教育》，台北：聯經，1984。
11. 黃俊傑，〈什麼是「一流大學」〉，《通識在線》，2006，v3，頁22-24。
12. 黃俊傑，〈以人文精神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通識在線》。
13.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2。
14.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臺灣經驗與啟示》，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出版，2002。
15. 楊國樞、瞿海源、林文瑛編，《新世紀大學教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16. 劉兆玄，〈何謂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的目標〉，《通識在線》，2006，v1，頁8-9。
17. 德瑞克·柏克著，楊振富譯，《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台北：天下遠見，2004。
18. 歐陽教，黃正傑主編，《大學教育的理想》，台北：師大書苑，1994。
19. 懷德海著，吳志宏譯，《教育的目的》，台北：桂冠，1994。

##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draw on the original spirit of University and have a reflec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owadays. In fact,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s the contents of anci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exactly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general education. But we can see today's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aiwan emphasis too much 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too les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What is called Education is the one that begins with humanity enlightening, not the one that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only. So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should come back to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intellectual who can b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ociety, build up the full personality of students, and try to face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beyond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General education as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ducation of humanity enlightening is the co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should complete with general education.

If we have the goal of raising the culture which is declared in the law of University in mind, and have a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phenomenon and historical observation of Taiwan, then we should develop the profound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spirit in present general education so as to retrieve 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beacon of our society for universities.

**Keywords :** origin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profound culture, cultural, Equipment